

跨文化学的产生及其必要性*

王一川

摘要：跨文化学作为一门学科领域是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的时间里诞生的，在当代中国的有力开拓者为乐黛云先生。跨文化学是在文化现代性进程日益显露其忽视文化异质性的副作用力时间世的，是针对比较文化学而产生的一种纠偏式探询，致力于探究此前被文化共同性幻象所压抑的文化异质性如何在文化现代性进程中一直存在并发挥其特定的作用。

关键词：跨文化学的产生 跨文化学的必要性 文化同一性幻象 文化异质性

人类不同文化之间的跨文化交流由来已久，相互间的同与异之争也如影随形地相伴至今。在今天这个被人们以全球化时代、互联网时代、全媒体时代或人工智能时代等不同词语竞相表述的时代，本文化与异文化之间、众多异文化之间，其共同性似乎正变得越来越容易，如影视大众艺术的挖空了意义深度的轻喜剧风格的通行，折叠手机、5G等日常生活时尚的全球普及潮，一点也不令人奇怪。但与此同时，各种异文化之间的异质性或差异性也正变得越来越鲜明和引人注目，就连同一个民族中的不同网络群体在一瞬间说翻脸就翻脸了，更何况不同民族之间的沟通和交融就变得愈发艰难。这一点只要想想不时地发生的网络粉丝群的互喷或互撕奇观就够了，当然还可以联想到2020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此起彼伏的各种新媒体或自媒体平台上翻滚起伏地

* 本文为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文艺发展史与文艺高峰研究”之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18ZD02。

发生在亲朋、好友、同学、同事、乡亲、同人或“饭圈”等之间的种种纷争。一旦将这些至今也仍难以平息的网络舆论纷争，同有关国际国内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论断结合起来看，就会发现这个时代确实已经和正在变得越来越异彩纷呈、异口难调或异美难通，也就是人与人之间文化价值观的差异、分歧或争执日趋尖锐、剧烈和难以调和。总之，就连向来被作为共同的美好生活价值加以敬仰和追求的文化，如今都已变得令人惊异地多样化、差异化、异质化甚至异端化了。

正是置身在这样一个差异凸显、对话愈益艰难、异文化浪潮翻滚起伏的异常年代，跨文化学思考不仅不应当回避，而且更应当开展。此时从事跨文化思考，应当有助于了解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群体之间及个体之间的文化交流状况，以及处理与之相关的诸多问题。

“跨文化”一词在汉语领域的早期使用，诚然可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学术期刊中觅见一些踪影^①，而跨文化学思想及视角的运用也可上溯到更早的年代，但跨文化学学科在当代中国的有力开拓者无疑应为乐黛云先生。她在1993年指出：“我们正处于一个世界性的文化转型时期。在这种历史阶段，文化的横向开拓比一般的纵向发展显得更突出。所谓横向开拓，就是一种民族文化向他种民族文化借鉴，主流文化向边缘文化靠拢，一门学科向他种学科寻求渗透等。在这种情况下，曾经处于边缘地位的少数民族文化无疑将对主流文化的更新起很大的刺激作用。”^②这里已可见出从比较文学学科及比较文化学科转向跨文化学学科的初步意向，特别是所论不同文化及学科之间的“横向开拓”，想必已然明确地化用了西文中跨文化学之“跨-”字（trans-cross-, inter-）的基本含义。一年后她又指出：“目前的世纪转折时期，

① 1983年第2期《外国语文》有《介绍一门新兴学科——跨文化的交际》；1987年第1期《心理学探新》杂志刊有《学龄前儿童认知发展的跨文化的研究》一文；1991年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研究会主编学术辑刊《时代与思潮》中有论文《对中国思想的跨文化理解》。

② 乐黛云：《多民族文化研究的广阔前景》，《读书》，1993年第12期，第50—52页。

也是一个以横向开拓为特点的文化转型时期”，此时“比较文学研究的真义就在于跨学科，跨文化，跨时代（仅指跨文化状态，如中国古典文学与西方现代文学之研究）……在各种边缘的重叠交合之中，在不同文化的人们的视野融合的基础上，寻求新的起点，创造新的未来”。这里特别点出了“跨文化”一词，还强调“这种针对某一问题的跨文化研究”必然要“突破固定的学科界限”，而比较文学就应当具有“跨文化，跨学科，跨时代的根本性质”，以便“为铸造未来的多元共存的世界新文化作出应有的贡献”。^①到1999年，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六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中，已可见到这样的学术公告：“跨文化比较文学研究已成为比较文学未来发展的基本走向。”^②可以简要地说，跨文化学作为一门学科或学科领域是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的时间里诞生的。

与此同时，其他相关学科的学者也在关注跨文化学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末起持续关注跨文化问题的费孝通（1910—2005），在1997年也继此前使用英文词语“跨文化传播”（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之后使用了汉语词语“跨文化”：“我进入人类学领地，正是因为受到这种跨文化的人文价值观的激励。”他坦承自己关注本土文化并非为了把视野局限在本土文化界限内，而是“为了在了解自己的前提下，寻求不同人文类型和平共处的途径”，从而他的思考“既体现出一种对本土观念和不同文化价值观念的尊重，又力图展示文化之间互译和沟通的可能性”，因为他总是“强调世界全球化过程中不同民族文化在同一时间里并存的格局对实现‘天下大同’也许是必要的”。他还特别指出：“这确是一种异文化与本文化兼容并包的探索。”^③这就揭示出他在本文化与异文化之间寻求“兼容并包”的学科意图，

① 乐黛云：《比较文学研究的新视野》，《瞭望新闻周刊》，1994年第16期，第28—29页。

② 见姜源、刘荣撰：《迈向新世纪：多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六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6期，第175—180页。

③ 费孝通：《人文价值再思考》，《费孝通全集》，第16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56页。

尽管他并没有明确提出跨文化学的构想。他在1999年还提及说：“在乐黛云同志编的《跨文化对话》这本书里有文章认为，历史上对待异文化有几种态度。”^①

跨文化学，是在文化差异、文化异质性、异文化等相关问题已然成为文化现代性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关键问题时应运而生的。在当前探讨文化、文化学及跨文化学等相关问题，需要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当前世界各民族文化不是单数的而是复数的，不是完全共同的而是在共同中有不同，在异质性中有共同性。今天不再是梁启超于1901年提出的“三个中国”说中的“中国之中国”时代，也不再是稍后的“亚洲之中国”时代，而是仍旧处在其第三个“中国”之中的“世界之中国”时代。^②在此时代，即便世界各民族文化都无一例外地行进在文化现代性的大道上，向着文化共同性这一共同目标前进，但它们由于各自的出发点、时间点及具体路径相互不同，对文化共同性的认识和理解也就有差异，从而在文化共同性追求中不可避免地会渗透进自身独特的文化异质性因素。这样，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得不关注与己不同的异文化，从而也都不得不倚靠异文化这面他者之镜来区别和证明自身。因为，自我不能紧紧倚靠自己去定义自我，而只有通过他者这面镜子的映照，才能瞥见自我、定义自我。因此，此刻探讨任何一种文化问题，本身就不可避免地要把特定的本文化同与己接触的异文化或文化异质性因素结合起来思考，渗透进有关本文化与异文化的关联性视角，从而本身就或多或少地带有跨文化学的性质了。

如此，跨文化学学科的产生，其实是出于一种迫不得已：在此之前，存在着一种达成广泛共识的文化主张，相信人类世界各民族文化虽然各有其独特的民族特性，但总会予以逐步克制或消除，而朝向现代性或现代化这个共同目标。不妨把这种主张称为文化共同性或文化

① 费孝通：《必须端正对异文化的态度》，《费孝通全集》，第16卷，第431页。

② 参见梁启超：《中国史叙论》，据吴松等：《饮冰室文集点校》，第三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626—1627页。

同一性幻象。文化共同性幻象当然不会轻易否定不同文化之间存在异质性，但是更坚定地相信，在通向文化现代性的洪流中，各种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间可以将这些异质性加以克服或消除，从而实现共同性。相比而言，文化异质性只是其次的或次要的，文化共同性才是真理，是第一位的。由这种文化共同性信念支撑起来的学问，可以称为比较文化学。比较文化学，无论是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还是作为一个多学科交融的跨学科领域，就是当多种不同的民族文化在朝向共同的文化现代性目标推进时所设立的知识论范式。这种知识论范式帮助人们树立一个共同信念，即各民族文化之间诚然有不同，但终究都可以在一个共同的文化现代性目标下团结、凝聚为一个新的联合体。比较文化学学科是旨在研究全球文化现代性的文化学的一部分，它主要处理不同民族朝向文化现代性目标时如何克服民族异质性或多样性的问题。它致力于通过不同民族间文化比较研究而寻找到克服民族一致性而通向共同的文化现代性目标的道路。

平心而论，这种文化共同性幻象及比较文化学思考，在其兴起之时也是有其特定缘由的，从而也是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性的，即有助于打破东西方文化之间、不同民族文化之间不可沟通的壁垒，把新兴的文化现代性视为不可阻挡的世界主流，引领世界上一切民族文化都排除一切干扰和阻碍而走向文化现代性。例如，当衰落中的中国古典帝制在西方列强的猛烈冲击下更加腐朽不堪、急剧崩裂之时，急需拯救的中国将变法自强的目标聚焦于文化现代性上，设定并相信这个共同目标能够带领中国走过激流险滩而转危为安。可以说，遥想当年，正是文化现代性这个统一的目标引领中国毅然毁掉古典帝制而建立起现代民族国家，进而在军阀混战、外敌入侵、内忧外患等阻碍之中逐步地推进自身的文化现代性进程。在这个意义上说，建立在文化共同性信念基础上的比较文化学思想，对于各民族文化挣脱旧的知识性的束缚，在现代性目标下整合起来，是建立过历史性功绩的。这一点必须承认和不容否定。

不过，在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业已持续百余年、并且仍将持续下去的今天，回头检视这个进程本身的风风雨雨，不能不看到如下事实：与文化共同性相对立的文化异质性愈发清晰地显露出来，并且日益暴露其此前被忽略或无视、至今已令人无法回避的作用力。假如说世间发生的每一件事物，都既有其作用或正作用又有其副作用的话，那么，当其把最初的令人向往的作用逐渐地和完全地释放开来后，剩余的就必然有副作用了。要想每一件事物都只呈现作用而不呈现副作用，那无疑只是自欺欺人的主观幻想。过去百年来，正是文化共同性目标吸引着中国人冲破来自外部和内部的重重阻碍，不可阻挡地奔向同一个文化现代性目标。百年后，当这种文化现代性进程进展到这样一种地步，以致走在同一条文化现代性道路上的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竟然呈现出那样繁多而又那样难以归一的异质性或差异性之时，重新调整原有的关于文化共同性及比较文化学范式的作用力的认识，转而正视文化异质性的副作用力，就是必然的了。

跨文化学，就是在文化现代性进程日益显露其忽视异文化或文化异质性的副作用力时问世的。它作为文化学的一部分，是针对比较文化学而产生的一种纠偏式探询，致力于探究此前被文化共同性幻象所压抑的异文化或文化异质性，如何在文化现代性进程中一直存在并发挥其特定的作用。